

中国的人口总数由商周时期的千万人左右发展到清末的4亿人，其过程并非等量增长，中间经历了几次反复和爬升，重要的梯级有1000万人、5000万人、1亿人等。造成人口梯级性增长的原因，除政治、军事甚至气候变化等因素外，经济因素无疑更为重要。

中国古代人口梯级增长

由商周千万人到清末4亿人

千年徘徊

关于人口增长的规律，马尔萨斯有一个著名理论，认为人口在“无妨碍条件下”每25年会增加一倍。如果按这个速度计算，即使把西汉时期的公元元年中国人口总数假定为1000万人，到公元5世纪初的东晋时总人口就会突破1亿人了，但事实上这两个时期的人口数没有太大差别。

马尔萨斯认为在“无妨碍条件下”人口以几何级数率增加，但生活资料以算术级数率增加，一个是2、4、8、16……，一个是1、2、3、4……按照这个速率，只需经过200年，人口对生活资料的比例将会达到256比9，300年是4096比13，生活资料是制约人口自然增长的最主要原因。

先秦时期的人口总数一直处在低位徘徊阶段。据赵

文林、谢淑君《中国人口史》，夏代的人口约1300万人，经过近2000年的发展，到战国末期仍大体保持在这一水平，秦统一时人口总数估计为2000万人。2000年的时间不可谓不漫长，但人口总数基本保持了稳定，原因就是生活资料供给的约束。

这一阶段是中国传统农业的萌芽期，出现了粟、黍等被驯化栽培的农作物，青铜农具代替了石质农具，又初步掌握了物候知识和天文历，农业经济有了初步发展，为养活上千万人口提供了物质基础。但总体来说，这一阶段的农业生产还处在粗放和落后阶段，农作物品种单一，青铜农具存在很多缺陷，缺乏水利基础设施保障，生活资料的增长受到极大制约，加上战乱、自然灾害等，人口始终维持在同一水平。

农业突破

中国第一次人口梯级出现在汉代。据《汉书·地理志》，西汉平帝元始二年(2年)全国总人口数达到了5900万人左右，西汉末年人口数虽然锐降，但到了东汉初期又快速回升。据《后汉书·郡国志》，东汉明帝永平十八年(75年)人口总数为3400万人，章帝章和二年(88年)为4300万人，桓帝永寿三年(157年)为5600万人。

两汉300多年间人口总数大体在5000万上下波动，较夏商周三代有了质的突破，除了统一王朝带来的社会稳定以及战争的减少外，生产的发展，尤其是农业技术的突破性进步是关键原因。

汉代进入中国传统农业的形成期，农业由粗放逐步向精细发展。农具进入铁器时代，出现了铁犁壁、二人三牛的耦犁以及铁耙、风车、水车、石磨等先进生产工具，畜力成为生产的主要动力，耕作的速度和质量都大为提高。农作物品种也更为丰富，通过丝绸之路等途径的传递，大量新品种农作物被引进。对水利建设和农业生产经

验的总结也更加重视，出现了更为精确的历法。这些使得徘徊了2000年的劳动生产率得到质的飞跃。

夏商时的粮食亩产量缺少文献记载，《管子》说过“一农之事，终岁耕百亩，百亩之收，不过二十钟”，这说的是春秋时期的产量，亩产0.2钟，1钟为10石，即亩产2石。

汉代粮食亩产量有了突破性提高。《前汉纪》谈及西汉文帝时的亩产：“今夫农五口之家，其服作者不过二人，其能耕者不过百亩。百亩之收，不过三百石。”即亩产3石。《史记·河渠书》讲5000顷耕地“今溉田之，度可得谷二百万石以上”，5000顷合50万亩，即亩产4石。

汉末嵇康《养生论》：“夫田种者，一亩十斛，谓之良田，此天下通称之也。”1斛即1石，这里说亩产10石，不过不是粮食的普遍产量，而是“良田”。

不管怎么说，汉代粮食单产较先秦时期有了较大提高，《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》估算，汉代粟的亩产量超过了140公斤。

重心南移

汉代人口达到5000万人梯级后又出现了新的徘徊，其间发生的战争固然对人口变化有一定影响，但新的峰值出现后便不再进一步突破，根本原因是经济对人口的支撑作用又出现了新的瓶颈。

魏晋以后国家出现分裂，人口一度出现了波谷。据《中国人口史》推测，三国时期人口总数在1400万人至1800万人之间，西晋的人口总数约为2000万人，随后人口出现了缓慢回升，南北朝人口最鼎盛时达到了4200万人，隋统一时约为4900万人。

从汉末到隋初，人口重回5000万人梯级用了300多年，与大一统时期的两汉不同，这段时间国家处在更大的分裂与动荡之中，政权分割，战事频发，对经济发展造成了极大破坏，严重制约了人口增长。在这种恶劣条件下人

口总数重新回升，得益于经济重心的南移。

晋代之前中国的经济重心一直在北方，广大南方地区虽然早已被纳入国家版图，但那里地广人稀，多属未开化之地，一直到汉末，黄河流域都是人口密集区。据《中国人口史》的研究，东汉时的公元140年，今河南省辖区内人口约923万人、山东省约863万人，而同期浙江省约81万人、广东省约86万人。

从西晋末年经济重心逐渐南移，江南地区气候较闷热，土地肥沃，更适合耕种。北方地区虽开垦较久，但潜力已经不大，且战乱多发，迫使大量人口南迁。

汉末至隋初数百年的战乱虽然严重削弱了生活资料的供给，但江南的开发恰好弥补了这一不足，所以人口总数才能重新回到5000万人的梯级。

结构矛盾

唐宋以后经济进一步发展，不仅社会相对稳定，而且江南的开发进一步持续，这为生活资料的不断积累创造了条件。在社会总供给量不断增加的推动下，人口也在不断增长，到宋朝时人口总数跃上了1亿人的新梯级。

在主要依靠传统农业的情况下，养活1亿人并非易事，除生产技术的进一步提高、新农作物的进一步推广外，各地区的均衡发展，尤其是江南地区的深度开发功不可没。据《中国人口史》的研究，南宋时今江西省辖区内的人口达到1025万人，而同期河北省仅为466万人，江南地区后来居上。

1亿人的梯级一直保持到清初，抛开其间因王朝更迭而出现的暂时人口下降外，人口总数基本上又稳定了数百年。人口增长出现新的停顿，意味着生活资料供给又出现了新的瓶颈。

在此之前一直强调农业的重要性，但在经济结构中农业并非唯一构成，自然经济条件的小农经济无法支撑起一个强大的国家。所谓“生活资料”，也并非吃饱穿暖那么简单。宋、明之间人口出现了新的徘徊，与经济结构矛盾不无关系。这是一个由量到质的转变，意味着供需矛盾出现了新变化，明朝中期以后出现的消费变化更能说明问题。

明朝中期开始，人们的消费观逐步由朴素变为追求享受，一些原本只有皇室、贵族和官员才有资格享受的衣食住行逐渐走向商业化和世俗化。从饮食消费看，一部分富裕家庭开始讲究起来；从服饰消费看，人们逐渐突破了原有的服饰制度，富裕人家竟尚奢华；从住房消费看，不仅房舍等第之分不断被突破，而且在江南兴起了“园林热”，由士人带动，富商跟进，私家园林被大量修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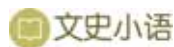
这种“消费升级”现象是之前历代所没有的，与当时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变革不无关联。当时欧洲一些国家正在经历着一场工业革命，传统农业已退出经济的主导地位，手工业、服务业快速发展。这种现象既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，又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。

但是，中国受到了这种潮流的影响没能跟上这个潮流。由于经济政策的保守和失误，明朝在这一轮经济结构调整中总体是失败的，传统农业依然占据了国家经济90%以上的份额，生产效率难以得到提升，整个明朝200多年间GDP增速平均不到0.3%，不仅经济总供给量不足，供给的结构性矛盾也十分突出。

从数千年中国人口增长的几次梯级变化可以看出，真正起制约作用的还是经济因素。经济增长提供了更多的生活资料从而促进了人口的增长，但经济增长又不可能永远按照一个速度持续向前，它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。经济发展取得一次突破后又会遇到新的瓶颈，形成新的“供给约束”，这大概才是左右历史发展进程的关键。

新的“供给约束”既有量的一面，也有质的一面，当人们不再只满足于基本生存需要时，影响人口增长的“生活资料”便出现了新的内涵。改善供给既要重量也要重质，这使得突破“供给约束”变得越来越困难，但每一次梯级性突破都会迎来数百年持续的新发展。 (据《北京日报》)

子罕辞玉：尔以金玉为宝，吾以廉谨为宝



你把宝贝给了我，咱俩就都把“宝贝”丢了

《礼记·礼运》：“礼也者，义之实也。”也就是说，要反对盲目性，做任何事要讲道理，弄明白什么该做再去做。下面来讲讲古人的廉洁观。

一个典故是“子罕辞玉”。《左传·襄公十五年》记载，宋国有人得到一块玉，拿去献给当政的子罕，子罕不接受。送玉的人说：“我给玉工看过了，都说是宝贝，才敢来献给您。”子罕说：“我把不贪当作宝贝，你把玉当作宝贝，要是你给了我，咱俩就都把‘宝贝’丢了，还不如各自拥有自己的‘宝贝’呢！”献玉的人哀告：“我揣着宝玉，没有办法出境，献给您来

免去一死。”子罕安排他住下，让玉工帮他加工好，等他富有了再让他回老家去。这就是“尔以金玉为宝，吾以廉谨为宝”的故事。

另一个典故是“杨震辞金”。典出《后汉书·杨震传》。杨震作荆州刺史时，举荐王密为昌邑县令。杨震后来任东莱太守，从王密的领地经过，王密入夜以后怀金千斤送给杨震，杨震不肯接受。王密说：“夜里是不会有别人知道的。”杨震说：“天知，神知，我知，你知。你怎么说没人知道呢？”王密惭愧而回。这就是“尔以昏夜可纳，吾将暗室不欺”的故事。

古代还有境界更高的廉洁者。《国语》记载：楚国有一人有很多的政绩，楚成王时常要给他一些赏赐。一到这时候，他就逃走，等成王不赏赐他了再回来。

有人对他说：“人生谁不求富，你何必逃富呢？”他说：“从政是为了庇护老百姓，很多老百姓还那么穷，我去求富，是用百姓的怨恨来自封，那不是找死吗？我逃的是死，不是逃富。”这就是一种境界，今天的人能够算清这笔账，也就不会贪腐了。

(据《北京日报》)